

書 評

戚 軒 銘^{*}

馮樹勳

《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338 頁，ISBN 9789863500858

近數十年來，多個考古的重大發現使得學界對於早期中國的歷史有了重新的認識。這些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材料，讓我們解決一些在過去懸疑未決的學術議題。但筆者以為，如何在既有資料的基礎上尋找可行的視點進行研究，或許更值得學者深思。畢竟，新材料的發現可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馮樹勳這部專著便是近年其中一部嘗試在方法上尋求突破，藉以探討漢代學術思想史的力作。

本書題為《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顧名思義，它的討論重心是揚雄及其思想，並以此為基礎考察西漢學術和思想的發展。近代學者基本上認同揚雄在西漢思想史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¹但正如馮氏所言，揚雄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為何學界過去對揚雄有著不同、甚至是對立的評價？又我們應如何評價揚雄在西漢思想史上的地位？為

2017 年 1 月 23 日收稿，2017 年 4 月 17 日修訂完成，2017 年 5 月 2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國際語言文化學院博士生。

Hin Ming Frankie Chik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etters and Cultures a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Tempe, U.S.A.

1 如徐復觀，《兩漢思想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卷 2，頁 303。

何這位具爭議性的人物會如徐復觀所言，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都是研究揚雄思想者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而本書在回應上述問題時，大都圍繞著兩組關鍵詞來進行討論：即副標題之「範式」和「折中」。作者並沒有為「範式」下一準確的定義。但綜觀全書，作者所言之「範式」應是指某段時期或某個學派的思想特徵和趨向。至於所謂「折中」，作者於第一章已明言：「必賴乎以理念為『權衡』……而不是把各種不同的觀點無原則地拼湊在一起。」（頁 20）簡言之，本書所關注的問題是揚雄在面對西漢各個領域的不同範式時，如何自覺地建立其思想。這種研究視點對於我們釐清揚雄思想本身、乃至其淵源都是很有幫助的。

全書計有引論（第一章）、本論（第二至七章）和結論（第八章）三部分。引論除了交代上述研究角度外，更嘗試通過對人文學的詮釋方法的反思來概括全書的框架。第二章的內容雖沒有涉及揚雄如何在不同範式間「折中」，卻非常詳細地探討了揚雄早年入仕的經歷與其政治主張。班固《漢書》一般被認為是研究西漢歷史與當時人物生平最權威的文獻，然而當中的內容卻時有不準確的地方，亦因此造成研究上的困難。其中有關揚雄的生平記載便多有矛盾，使揚雄於何年開始入仕這個問題一直未有定論。作者對此情況有充分的了解，且有意識地突破材料上的限制，以劉歆〈與揚雄書〉和揚雄〈答劉歆書〉兩封書信來推斷揚雄初仕的時年。他首先推算兩封書信分別成書於元始五年（5）或居攝元年（6），以及居攝元年四月，並以此為定盤針推斷揚雄在陽朔四年（前 21）為郎官。如作者所言，此一推斷可與班固有關揚雄的記載協調，例如揚雄與王莽和劉歆同官，以及王音如何任用揚雄的問題。相比單以《漢書》為本，這種做法得出的結論明顯更具說服力。隨後，作者通過揚雄四大賦和〈趙充國頌〉分析了他的政治與外交主張，並強調揚雄非如徐復觀等論者所云，是位缺乏鮮明政治主張的文臣。（頁 47）

第三章討論了揚雄如何在先秦「美言不文」與西漢「詩賦欲麗」這兩種典範之間建立其美學思想。作者指出於揚雄而言，文學一方面要符合儒家的道德價值，另一方面需要重視形象，以達致「麗以則」的境界。因此，賦可算是一種創作的歷程，卻不是最高的藝術標準。究其原因，在於賦的表現方式重視利用文字刺激感官，以致未能達到諷喻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賦很容易讓快感取代美感，成為「麗以淫」的作品。揚雄這種嚴分快感和美感的

做法，使他的文學觀有別於以司馬相如爲首的西漢唯美的文學標準。最後，作者指出揚雄如何在文（意象）與質（情趣）之間取得平衡，並以藝術與人格的推進歷程來說明「感覺」如何在文藝作品中恰當地表現出來。

第四至六章集中分析《太玄》的內容。第四章討論了《太玄》中一些重要的概念。它指出「玄」並非經驗可認知的。因此《太玄》並沒有爲「玄」下一精確的定義，而是討論其功能——陰陽二氣的交互作用。在漢代天人合一的基礎上，以及爲了讓人類把握作爲宇宙本源之「玄」，該書更在天和地中加上人，進而組成了三儀。而三儀所構成的世界規律，則可通過三進制（而非《易》的二進制）來了解。隨後，馮氏說明了《太玄》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架構。作者對於學界認爲《太玄》的曆法架構源自《淮南子》或漢代《易》卦氣說的觀點頗不以爲然。反之，他認爲《太玄》以子爲歲很可能與漢代的太初曆和三統曆有關。另外，在討論《太玄》中日和斗的運行軌跡時，作者通過細緻的文本分析，有力地指出劉韶軍的日行和斗行示意圖與《太玄》一書的內容相抵觸。其錯誤的原因，在於劉氏未能準確理解揚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一句的意思。²（頁 115-116）至於《太玄》的五行結構，據作者分析，與《春秋繁露》和《淮南子》中的五行理論均有異同處。

第五章則探討了《太玄》與《易》的關係。《太玄》與《易》的關係爲何，學界主要有兩種說法：「擬易」和「準易」。所謂「擬易」者，即認爲《太玄》摹擬《易》，兩者處於一種非平衡的關係之中。儘管《太玄》與《易》和漢代的《易》說有不少相似之處，但誠如作者所言，單純列舉兩者的相似之處便謂《太玄》仿《易》而作是一種虛假原因的謬誤。至於「準易」說則認爲《太玄》與《易》處於一種平衡關係之中。但是，「準易」說卻無法解釋爲何揚雄在《易》之外，再建立一套既相似但又相異的系統。爲了準確解釋兩者的關係，作者於這章中從《易》學自孔子時由卜筮《易》到義理《易》的範式轉移談起，指出揚雄當時正面對儒家學派內部有關義理《易》和卜筮《易》的分歧，以及受到外部結合道家思想的《易》學的「刺激」（而非「承傳」）。爲

2 原文見漢·揚雄，宋·司馬光集注，劉韶軍點校，《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7，頁 188。

了弘揚聖（孔子）道，故他在《易》學的子系統外建立一個與《易》功能類似但運作方式相異的《太玄》系統。馮氏又指出揚雄撰寫《太玄》的目的是希望它能與《易》一樣指向仁義。因此兩者雖屬「殊塗」，但它們卻是「殊塗而同歸」。誠然，將《太玄》一書置於漢代典範衝突這個歷史語境中，的確比單純比較《太玄》與《易》的內容更能把握《太玄》的成書動機及它與《易》的關係。畢竟一位思想家所建立的學術體系，必定是用來回應當時他所面對和關注的問題的。既然《太玄》的體系與《易》既同且異，又是什麼原因驅使揚雄在《易》學以外另闢蹊徑，但同時又以《易》作為參照點？純粹的比較方法已無法回應這個問題。而以當時的典範衝突作為解答上述問題的切入點，正好讓我們了解到揚雄撰《太玄》的動機：希望通過這個「殊塗」的系統，來讓孔子所建立的《易》學典範得以回應其他典範的挑戰。

第六章則辨明《太玄》的思想是儒主道輔。學界普遍認為《太玄》一書包含了儒道兩家之思想。但到底何者處於主導地位？作者指出現存有平衡說與非平衡說兩種說法，而後者又可分為儒主道輔說和道主儒輔說。作者認為過去學界在討論有關問題時所採用的方法，包括從揚雄與嚴君平的師承關係來確定當中的核心思想、以及抽取《太玄》中與儒道思想相似的觀念下判斷，都是不足取的。因前者忽略了思想家不一定完全受老師的影響，而是可以提出與其師不同的思想主張；而後者則無法決定哪種思想更為重要，而落入誰與定其是非的泥沼之中。為了解決前賢方法上的缺陷，作者在本章中以《太玄》的核心概念：仁義、玄、陰陽、文質等為討論中心，窺探當儒道兩家對這些觀念的理解存有分歧時，揚雄有何抉擇，並以此看出儒道何者在《太玄》一書中更為重要。通過以上方法，作者證明了過去較少人注意的儒主道輔說似乎更能把握《太玄》的思想傾向。當然，正如下文將會提到，本章所關注到的一些《太玄》核心概念是否必然趨向儒家思想，仍有可討論的地方。但是，作者的做法的確是探討《太玄》，乃至其他思想家的主導思想的一個相對有效方法。蓋作為全書最中心的概念，它們實是構築《太玄》系統不可或缺者。揚雄對這些概念的取捨，正好見出他更重視哪種思想。而書中其他較為次要的觀念，不論它們是傾向於儒家或道家，都不可與這些核心概念相抵觸。即是說，當中的次要概念都是為了中心概念而服務的。故此，相比隨機挑選與儒道思想相合的觀念來判斷揚雄主導思想的做法，這種通過集中分析《太

玄》中心概念來決定其思想歸趨的方法明顯更有說服力。

第七章以「類我」和「自主」為出發點討論了揚雄的教育觀。作者通過《法言》的內容指出揚雄認為西漢時期的教育模式主要存在幾個問題：1. 學者為利而學、2. 章句之學過於繁瑣，而學者視野也變得狹隘、3. 學者只師法經典及當中的文字，而不是師法孔子的德行（文本類我）。揚雄因此對當時的教育模式作出了幾項建議。首先，他以顏淵為例，強調學者應為道而學；同時，為了使學者能直接了解經典的意思，他主張解除條科；而為了使學者人格完備，他提倡以師和聖人為對象，學習他們的人格和行事（人格類我）。作者隨後探討了揚雄如何調和「類我」導致獨斷與學生失卻自主性的問題。作者指出對於揚雄而言，聖人與一般人無異，因為他們同樣需要遵守道德原則。人亦可運用其智與驗來判斷某人所言是否合理、以及他是否真心遵從道德，而非只為名利而行。學者因而能避免盲從權威而失卻自我判斷力，而被肖者亦不會因此而獨斷。

第八章為該書之結論部分。作者總結了前六章的討論，並重申揚雄之所以要摹擬過去的典範，在於唯有充分掌握各種典範的內容，他方能在各個範式中「折中」，並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

從上可見，通過對文本的仔細爬梳，作者很有洞見地指出前人對於揚雄思想的一些誤解。但筆者以為本書最具啟發性的地方，在於作者有意識地嘗試突破過去研究在方法上的局限來重新探討揚雄思想的本質。正如上文所言，「範式」和「折中」一直是馮氏著作中的中心概念，那麼揚雄「折中」的準則，或作者所云之理念為何？綜觀全書，我們不難發現揚雄在面對當時各種領域不同的學術範式時，都希望能回復由孔子所建立的典範。當然，揚雄並非一位全然「復古」的學者。從本書分析所見，他並不排斥其他學說或典範，只是這些學說都必須以符合儒家經典所示之典範為前題。而正是由於儒家經典所示的典範在漢世已受到挑戰，揚雄才試圖通過「折中」各種典範，使他心目中正宗的儒家典範得以弘揚。這點於作者的分析中已是清晰可見。馮氏以此為本書之研究視角，的確能讓學者掌握揚雄思想之精要。

當然，本書亦有可商榷之處。其中最明顯的見於本書針對董仲舒於揚雄、乃至整個漢代思想的影響的論述上。作者過去曾撰專著詳細討論董仲舒的陰

陽五行思想。³ 在本書中，作者亦多番強調揚雄在思想上如何受董仲舒思想，特別是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例如，他指出《太玄》陽高陰低的論調本自董仲舒天人之說。（頁 96；其他例子見頁 101、180）但是，當中的論證卻存在兩個問題。首先，作者在提到董仲舒的影響時，論證都非常簡單。作者曾多次提到「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自董仲舒，但是，董仲舒是否為第一位提出有關觀念的學者？抑或在董子以前，「天人合一」的思想已有很悠久的傳統？即使董仲舒是提倡天人合一的第一人，揚雄是否必定受其影響？作者嘗謂所謂之影響不一定是指「思想上傳承的直接關係」，而可能是指二人之思想「有密切血緣的近親關係」。（頁 216）但是作者卻曾直言《太玄》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源自董生。這種表述不是如同作者所言之「虛假原因的謬誤」嗎？另外，作者在提及漢代重視形象的文學觀與儒家天人相應思想有關時，也沒有提供充足的論證。（頁 60）

其次，作者並沒有考證所引之文獻是否為反映董仲舒思想最可靠的資料。觀乎本書的論證過程，作者主要依據《春秋繁露》來闡述董仲舒的思想觀點。例如在討論太初曆和三統曆如何影響《太玄》的思想時，馮氏便引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中有關三統的論述，並認為有關論述是由董仲舒提出的。（頁 126-127）但《春秋繁露》一書的所有篇章是否必定為董氏所撰，學界對此早有懷疑。以〈三代改制質文〉為例，清人蘇輿（1874-1914）已明言：「此篇非董子文。」⁴ 英國學者魯惟一（Michael Loewe）亦注意到《春秋繁露》各篇的作者問題。⁵ 因此，作者在引用一手文獻以支持其說時，似亦有必要注意有關文獻的作者為何。

3 參馮樹勳，《陰陽五行的階位秩序：董仲舒的儒學思想》（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4 漢·董仲舒，清·蘇輿，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23，頁 213。

5 見 Michael Loewe, *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 (Leiden: Brill, 2011). 特別是該書的第五、六章。